

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经验研究*

杜金华¹，陈治国²

(1.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2. 咸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 当前土地财政确保了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 社会对项目的整体实施效果要求越来越高, 居民评价的重要性凸显。本文在分析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作用机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基于 CGSS 微观数据, 实证检验了土地财政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关系, 研究发现土地财政提高了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价水平, 其对东部、发达地区和非市中心的居民评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究其原因, 土地财政通过改善投资效率提高了居民评价, 支撑的市政基础设施投资从效率方面提高了居民评价, 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 把大量的土地财政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 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 提高了自身竞争力, 改善了居民生活便利性, 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社会评价。

关键词: 土地财政; 城市基础设施; 投资效率; 社会评价

一、引言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 吸引区外资本和获得选民支持成为增强地方竞争力的重点, 地方政府会互相通过税收和公共服务手段进行经济竞争, 而溢出效应和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竞争行为会导致公共品供给偏离最优水平 (Zodrow, 1989; Cremer, 1997)。Hayek (1945) 认为, 相对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拥有信息优势和较低的行政成本, 有助于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但是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以及地区间财政供给能力的差异, 财政分权有可能会造成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下降以及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偏低等问题, 从而对社会福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Casas, 1997)。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承担了很多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供给责任, 而财权上收弱化了地方负担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受制于自身财力有限和增长竞争的约束, 地方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 制约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发展, 加剧了地区间公共财政资源分配或公共品供给的失衡 (乔宝云, 2002、2005; 王永钦, 2007; West and Wong, 1995)。这样, 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驱使地方的“援助之手”转变为“攫取之手”

(陈抗等, 2002; 王文剑, 2008)。张五常 (2009) 认为, 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县级政府间竞争更为激烈, 最终导致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当参与竞争性的政府数量较多时, 地方政府则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 政府只能利用掌握的土地租金来满足竞争需要 (Epple and Zelenitz, 1981)。税收集权驱使着地方政府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 (孙秀林, 2013), 激励了地方扩大预算外收入的动机, 加大了对土地资源的攫取, 积累了大量公共投资。于是分税制后地方借助土地资源减缓了财政收支压力, 改善了基础设施环境, 并保持了增长竞争优势, 符合了财政分权理念。然而, 现有文献基本上都是从供给主体角度或者供给能力角度阐述在财政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资源改善发展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本质, 从供给水平或者投资角度评价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绩效 (左翔, 2013; 王贤彬 2014; 等), 却鲜有研究分析微观公共服务消费主体的评价, 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增长方式正处于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过程阶段, 公共服务型政府则是财政分权本质的深化, 把人民满意度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强水利、铁

作者简介: 杜金华 (1984 -), 男, 山东潍坊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博士生, 研究方向: 财政理论与政策; 陈治国 (1984 -), 男, 陕西西安人, 咸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 经济理论与政策。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中失地农民融资困境的形成、现状及治理研究”(71503118) 的阶段性成果。

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仍然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且在深化机构和行政改革方面，强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把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比较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深入探讨土地财政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评价的关系就显得比较重要，既可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社会评价进行补充，也为转变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模式提供对策建议。基于上述逻辑分析，本文将城市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土地财政对于基础设施供给评价的影响。

二、机制分析

当前在以土地投融资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发展模式下，土地财政缓解了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困境，土地投融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城市化效应、福利效应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发挥能够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公共服务消费，进而影响居民满意度评价。首先，土地财政可以直接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是减缓贫困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多个东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研究，Rosenstein & Rodan (1943) 发现铁路、公路、隧道、发电站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立有利于刺激国内投资，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目前，虽然学术界对生产性公共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论断存在争议，但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还是占了主流。在通常情况下，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降低交通运输和信息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接近性，从而提高投资收益 (Hummels, 1999; Aschauer, 1989)。基于 1870 - 2009 年间 18 个 OECD 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考察，Farhadi (2015) 发现基础设施存量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成率的提高，基础投资回报率要超过私人投资回报率。

其次，城市基础设施的收入提升效应一部分源于经济增长效应 (Munnell & Cook, 1990)，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会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而得到提升，另一部分则源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文化技能，缩减收入差距，从而有效改善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Brenneman & Kerf, 2002; Castroleal et al., 2000)。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提高居民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性，企业和居民都会被城市宜居性所吸引，不仅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增加，而且居民就业规模也随之增加，不过城市宜居性对工资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变化 (Roback,

1982)。Munnell (1990) 的研究探讨了基础设施对就业的影响，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社区企业选址，进而对社区就业产生影响。Duffy - Deno & Dalenberg (1993) 的研究认为，一方面基础设施作为企业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社区基础设施会影响到生产要素投入，从而影响到厂商劳动力投入规模，另一方面作为周期较长的市政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对地区就业产生正的影响。基于 1999 - 2010 市级面板数据，邓明 (2014) 发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密度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肖挺 (2016) 发现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发达地区制造业就业情况所带来的正向影响最大。通过对 1980 年美国 254 个郡县的人口和住房普查数据进行研究，Blomquist et al. (1988) 分析了城市基础设施 (包括教育、犯罪率等 8 个指标) 和自然环境对居民工资的影响，发现改善的教育等条件有利于降低地区工资水平，而改善的环境基础设施却提高了地区工资水平。通过对 1992 - 2004 年间以色列公路和铁路的投资数据进行分析，Roni Frish & Shay Tsur (2010) 发现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公众在相邻地区的就业机会，提高了民众在区域间的流动性，尤其增加了男性 10% - 14% 的工资水平。同样通过对西班牙企业数据进行分析，Raymond (2015) 认为道路投资对生产力的影响越高，区域之间则更能完善连接，并且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带来了工资收入的上涨。

再次，基础设施产生的收入提升效应可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费能力，增加消费需求。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对于主观感受的影响需要借助消费信心、消费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健康满意度或就业等渠道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做出满意评价 (Frank & Enkawa, 2009; Dumludag, 2015)。城市基础设施增加社会需求的同时，还间接影响城市居民收入和改善城市消费环境，其对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间接影响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来带动消费；二是通过改善城市居民的消费环境来增加地区消费。城市基础设施的收入提升效应充分带动了城市居民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土地投融资通过支持城市发展、提高社区企业生产效率、创造就业机会等多种途径增加城市居民收入，为消费的可持续性增长提供保障。同时许多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消费存在高度依赖性和互补性，改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可以进一步放松居民的消费“瓶颈”约束，例如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当地电力供

应条件密切相关，供电设施的改善会推动居民购买家电的能力，刺激消费需求增加。因此，改善的城市物质基础设施条件和社会基础设施条件对于拓展地区消费能力、扩大市场作用具有较大的潜力，特别是电话普及率、铁路线路密度等（樊纲、王小鲁，2004）。

最后，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软环境，是城市形象的外在表现。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可以反映政府服务理念，公共服务的完备程度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城市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经济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更多地发挥了一种公共福利的社会效应（Mo，2001）。城市基础设施质量水平的改善有利公众对于政府执政理念的认识，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本。作为城市形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与城市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城市交通。例如，当前全国文明城市等品牌的标准明确规定了人均道路面积不低于10平方米，市民对交通便捷程度的满意率不低于70%。为了实施这些利民惠民的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政府不得不加大土地投融资程度，这对于提升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水平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满足企业和居民生活服务需求的服务能力，不仅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居民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本质是为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更满意的公共服务，而居民需要和经济增长也是土地投融资的出发点。最近几十年，在以地融资模式下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土地财政直接影响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水平和质量。但是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同时，土地财政依赖却导致了企业用地成本和房价水平攀升，意味着地区生活成本和工业用地成本的增加，导致企业产出效率下降。可见，在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投融资就会对基础设施评价带来不利影响。在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全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居民意见，接受居民监督，从而有利于建立执政为民、公众

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分析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评价的影响，就要分析基础设施供给是否满足了居民需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给的全过程中政府应当充分重视居民意见，接受居民监督，这样才有利于建立执政为民、公众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来自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居民对社会管理城市基础设施服务的满意度，相关数据来自于被访问者针对调查问题“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如何—城乡基础设施总体评价及需求”的回答，被解释变量采用0-100分评价，被采访者给予不同程度的评价分数。结合研究的需要，本文选择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如下：

$$Apprasies_{ic} = \alpha_1 Land_c + b_{ic} M_{ic} + g_c U_c + \varepsilon_{ic} \quad (1)$$

公式1中的下标ic表示城市c中的微观个体i，Appraise_{ic}表示城市c居民i的基础设施评价水平，M_{ic}为代表受访者的微观个体、家庭的特征变量，U_c为受访者所处城市c的特征变量，Land_c为受访者所处城市c的人均土地财政收入。由于本文研究重点为城市基础设施满意度，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评价，为被采访者给出的0-100间的评价度量。出于分析的方便，本文把评价分为五个标准，将[0, 50]划分为“非常不满意”，(50, 60]为不满意，(60, 70]为一般，(70, 80]为满意，(80, 100]为非常满意，并且将依次赋值为1-5。最终，在全部受访者中回答“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7.99%、21.57%、25.40%、25.46%、9.58%。为避免划分标准的主观性，本文随后对重新赋值的基础设施评价进行稳健性检验。不过，由于一些受访者的微观特征数据缺失，在删除相关缺失的无效样本后，实证分析样本量只有3130个。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ppraise	2.871	1.248	1	5
land	0.019	0.017	0.0004	0.122
gove	65.171	24.659	15.363	109.374
evegdg	1.407	0.742	0.292	2.471
grow	10.921	2.323	7.5	16.1

fdi	0.185	0.240	0.003	1.678
pop	786.06	473.213	92.4	3343.4
urb	51.316	30.941	4.767	95.199
den	699.726	581.109	25.33	2250.68
male	0.499	0.500	0	1
age	46.669	16.794	16	96
party	0.147	0.354	0	1
ma	0.753	0.431	0	1
edu	1.802	0.862	0	4
reg	0.593	0.491	0	1
health	3.830	1.001	1	5
inc	3.4779	8.3230	0	381.679
statusa	2.214	1.434	1	5
statusb	1.817	0.728	1	4
vote	0.520	0.786	0	2

(二) 变量选择和来源

参照相关文献研究,在选取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作为被解释变量外,还控制了一系列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Frey and Stutzer, 2000)。因此,本文构造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其中城市层面的社会经济变量包括: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 $evegdp$ (万元/人),为了验证瓦格纳法则是否存在,同时引入了人均 GDP 的平方项。鉴于经济总量与自身增长速度可能不同步,为进一步验证经济增速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本文控制了各地市 GDP 经济增长率 $grow$ (%),以被访者所在城市 2012 年的 GDP 增长率来度量;财政自给率 $gove$ (%),本文采用地级市的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表示;外商投资比重 fdi (%),用地市级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表示;人口密度 den (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越高的地级市越容易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规模,人口密度越大就越容易激励政府增大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力度,因此用于捕捉公共服务供给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如果规模经济影响了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那么人口密度将会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产生正的影响;人口规模 pop (万人),越高的人口规模可以获得较高的规模经济收益,或许伴随着辖区内异质性人口程度的上升,最终导致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偏好需求的难度加大(Alesina et al., 2004);城市化率 urb (%),采用受访者所处地级市的城镇居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该指标反映出拥挤效应,拥挤效应会导致物价上

涨,从而也会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价格的上涨,有可能降低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价水平。在微观层面,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年龄 age (年),从出生到 2012 年的实际年龄;性别 $male$,女赋值为 0,男的赋值为 1;受教育程度 edu ,按照调查结果把其他赋值为 0,然后按照教育阶段的不同依次赋值为 1-4;户籍身份 reg ,城市户口赋值为 1,农业和非城镇蓝印户籍为 0;政治身份 $party$,中共党员为 1,非中共党员为 0;自评健康状况 $health$,当受访者选择回答“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时,依次赋值为 1-5 的整数;居民家庭总收入 inc (万元);婚姻状况 ma ,没有结婚为 0,结婚为 1;居民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所属档次 $statusa$,居民回答“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其赋值依次为 1-5;居民自评与三年前相比的收入情况 ($statusb$),当受访者选择回答“上升”、“差不多”、“下降”、“不好说”时,其赋值依次为 1-4 整数;居民政治参与 $vote$,没有投票资格权赋值为 2,参加投票为 1,没有参加为 0。本文还在回归方程中按照研究需要控制了东部、中部、西部城市虚拟变量,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属于微观个体调查数据,来自于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的居民问卷。在删除了相关异常点后,有效样本为 3095。由于 CGSS2013 年居民问卷的时间完成于 2012 年,受完成时间限制,所有城市数据均滞后了一年,

为 2012 年的数据。受访者所处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 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2 年)和 CEIC。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三) 实证分析

1. 基本回归结果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城市基础设施满意度是一个有序变量,本文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 2 中的列(5)显示,在 1% 显著性水平上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从估计系数来看,表明土地财政提高了城市居民对基础设施状况的评价。总体而言,概率上作为地方最主要的自控财源收入在提升了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可能。因

此,受中国财政分权和政府治理转型影响,土地市场的繁荣和完善、住房商品化改革给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机遇。在向上负责的政治体制和财政分权的有效结合下,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有利于招商引资,而且也实现了更快的经济竞争增长和政绩改善。土地财政提高了城市居民对基础设施的评价,在户籍严格管控的大背景下,用脚投票机制无法反映辖区居民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时,城市基础设施评价对研究中国财政分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而分税制后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在财政分权下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真实揭示出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攫取之手”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居民对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

表 2 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 O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OLS	OLS	OLS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1)	(2)	(3)	(4)	(5)	(6)
land	3.877*** (2.67)	3.579** (2.15)	4.241** (2.52)	3.399*** (2.68)	3.220** (2.20)	3.834*** (2.58)
gove	-2.500* (-1.82)	5.161** (2.51)	0.295 (0.13)	-2.174** (-1.84)	4.153** (2.32)	-0.044 (-0.02)
evegdp		0.903*** (3.37)	1.115*** (4.10)		0.828*** (3.53)	1.020*** (4.26)
evegdp ²		-0.221*** (-2.80)	-0.309*** (-3.79)		-0.203*** (-2.98)	-0.282*** (-3.97)
grow		0.037*** (2.74)	0.029** (1.96)		0.034*** (2.94)	0.027** (2.10)
fdi		0.508*** (4.16)	0.533*** (4.39)		0.440*** (4.14)	0.462*** (4.36)
pop		0.119** (1.68)	0.154** (2.17)		1.086* (1.77)	0.139** (2.26)
urb		-0.010*** (-5.39)	-0.009*** (-4.53)		-8.963*** (-5.37)	-0.008*** (-4.56)
den		0.201*** (3.37)	0.167*** (2.75)		1.842*** (3.59)	0.155*** (2.98)
male	0.046 (1.03)	0.026 (0.59)	0.030 (0.68)	0.046 (1.22)	0.030 (0.79)	0.034 (0.88)
age	0.006*** (3.68)	0.006*** (3.44)	0.006*** (3.54)	0.005*** (3.72)	0.005*** (3.49)	0.005*** (3.59)
party	0.056 (0.83)	0.017 (0.25)	0.031 (0.46)	0.050 (0.86)	0.015 (0.26)	0.029 (0.49)
ma	0.042	0.021	0.024	0.035	0.017	0.020

	(0.81)	(0.40)	(0.47)	(0.79)	(0.38)	(0.45)
edu	-0.072**	-0.060*	-0.062*	-0.066**	-0.056**	-0.057**
	(-2.27)	(-1.89)	(-1.93)	(-2.41)	(-2.04)	(-2.08)
reg	0.080*	0.131***	0.125**	0.071*	0.114***	0.110**
	(1.64)	(2.64)	(2.51)	(1.71)	(2.66)	(2.55)
health	0.086***	0.092***	0.082***	0.074***	0.080***	0.072***
	(3.45)	(3.66)	(3.27)	(3.45)	(3.66)	(3.31)
inc	-5.583**	-0.745***	-0.625**	-0.460**	-0.624***	0.521**
	(-2.09)	(-2.78)	(-2.32)	(-1.99)	(-2.69)	(-2.22)
statusa	0.080***	0.086***	0.083***	0.068***	0.074***	0.072***
	(4.84)	(5.22)	(5.07)	(4.78)	(5.17)	(5.02)
statusb	-0.110***	-0.097***	-0.100***	-0.091***	-0.079***	-0.083***
	(-3.53)	(-3.10)	(-3.23)	(-3.37)	(-2.93)	(-3.04)
vote	0.068**	0.093***	0.086***	0.058**	0.081***	0.075***
	(2.45)	(3.33)	(3.07)	(2.47)	(3.37)	(3.12)
地区	YES	NO	YES	YES	NO	YES
准 R ²	0.044	0.054	0.061	0.054	0.058	0.050
N	3095	3095	3095	3095	3095	3095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性标准差。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在 1% 水平上人均实际 GDP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 GDP 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也在 1% 水平上为负，说明经济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居民对公共设施的评价会先提高而后会降低。城市经济增长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速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动了城市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基础设施评价水平。外商投资比重对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正相关，表明在增长竞争过程中地方政府会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外来投资和转移的技术。人口规模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充分获得基础设施规模经济效应。与此同时，人口密度的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而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变量系数为负，表明相对较高的城市化率造成了拥挤效应，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成本上升，从而不利于提高城市基础设施评价。

从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来分析，性别和政治身份对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对基础设施评价的水平为正，说明随着年龄增加，居民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更能利用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所带来的效用，所以提高了基础设施评价水平。教育程度对基础设施

评价水平为负，这或许与在所选择的样本中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被采访者比重占到 74.08% 有关，而且教育程度越高，对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越低。居民户籍身份影响了基础设施评价水平，相对不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居民更能充分利用良好的公共交通、通讯设施。个人健康状况也在 1% 水平上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评价水平，说明健康状况越好，居民在工作和生活中更能够享受基础设施带来的实惠。家庭总收入或者自我对经济状况评价偏低都显著降低了基础设施评价水平，说明相对收入的高低更容易影响基础设施评价。居民参与社区投票权利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表明居民认可对社区官员发展公共服务的行为产生了良好的监督作用，提高了地方提供基础设施的效率。

2. 土地财政的影响渠道

(1) 土地财政融资效率的检验

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效率也是当前较为关注的民生问题。当前很多政绩工程或民生工程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的特征，容易造成地方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加上地方融资渠道有限，土地财政就成为了地方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手段，成为政府担保贷款的重要保障。例如，为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标，2005 - 2010 年

间广州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并不仅仅用于弥补预算内财政缺口，而是为筹备亚运会投入到城市建设。甚至很多地方为了争相创办卫生城市或者园林城市，大力借助土地财政发展民生工程 and 政绩工程，因此土地出让收入显得尤为重要，土地抵押融资等筹集资金模式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地方融资平台通过银行贷款、债券、信托等多种手段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例，2010年末，全国地方性融资平

台规模共有1万多家，其中县级平台数目达到70%多，在当期人民币贷款中平台贷款占到30%。虽然2011年国家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进行了严格监管，但到2012年末，地方融资贷款余额仍有9.2亿元。据审计署公告所示，2012年末地方债务存量大概是地方财政收入的2.5倍。因此，土地财政在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表3 市政设施效率对居民评价的 Oprobit 影响

变量	(1)	(2)	(3)	(4)
综合效率	0.151*			
	(1.72)			
纯技术效率		0.328***		
		(4.77)		
规模效率			-0.097	
			(-1.14)	
规模报酬变化				0.015
				(0.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区域变量	YES	YES	YES	YES
准 R ²	0.068	0.069	0.068	0.068
观测值	3095	3095	3095	3095

注：***、**、*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性标准差。

因此，为了验证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机制是否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本文利用 DEA 模型，选取所观测城市样本为研究单元，分析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效率变化对居民评价的影响。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样本区域差异等自然因素，本文主要考虑除供热以外的供水、供气、道路以及园林绿化等设施，因此选取《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2年)城市用水普及率、建成区供水管和排水管密度、人均道路面积、污水处理率以及生活垃圾处理率作为产出指标，城市基础投资选用包括供水和排水、道路桥梁、环境卫生等五类。在此，借助 DEA 三阶段模型，考察受访者所处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效率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表3中的模型(1)、(2)、(3)、(4)分别给出了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规模报酬效率变化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市政基础设施投资的综合效率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水平，纯技术效率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产生了正的影响，而规模效率和规模报酬效应没有对

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产生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大规模的土地财政投入提升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促进了城市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最终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和促进城市集聚效应发挥，提升了居民生活便利性，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价水平。或许，受最近几年政府调控土地市场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影响，城市投资规模效率的下降趋势(刘倩倩，2017)和规模报酬变化较低现象导致了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不显著。

(2) “攫取之手”影响下的土地财政偏好

在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财政包干体制确定了地方剩余占有者的财政地位，地方财政更多受惠于辖区经济发展带来的财税收益，地方通过扩大信贷或投资规模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分税制后预算收入的集权效应凸显，严重削弱了地方财力，驱使地方通过体制外财政活动获得财源。王文剑和覃成林(2008)发现，不利的财政约束激励着地方政府把援助之手转变为攫取之手，并且这种攫取之

手在分税制后程度加重（陈抗，2002）。分税制后地方面对财政收支压力，在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加大对外招商力度后，税收超过同期 GDP 增长，尤其财政集权在激励地方为争夺资本而展开大力发展制造业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营业税和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等间接收益（方红生，2013）。受中央财税制度影响，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增加预算外财政收入的攫取渠道，王文剑和覃成林（2008）利用 1997 - 2003 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如果地区内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政府的“攫取之手”强度就越少，在城市化水平较高和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却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通过对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净流入和税收净流出地区的对比分析，方红生和张军（2013）发现，不管地区属于那种类型，中央政府的“攫取之手”和“援助之手”都会强化地方发展高税行业的积极性。陈刚等（2009）利用 1998 - 2006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一步发现，基于相对经济绩效考核的政治集权会加剧地方政府为谋取私人利益而使用资源支配权。因此，分税制后处于税收收入分配不利地位的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要素转让的一级市场，利用大规模土地出让收入和城市建设用地，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的方式为城市建设进行融资，最终逐步走向了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土地融

资与城市扩张之间的循环过程（孙秀林、周飞舟，2013）。财政收入集权化驱使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伸出了“攫取之手”。地方财政对于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虽然面对财政收支压力做出的“无奈之举”，但更多地充当了“攫取之手”角色，最终改善了地方发展高税产业和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环境，进而影响了城市基础设施评价。因此，在此本文分析了土地财政偏好对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由于我国自 2011 年全面取消预算外收入，所有政府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于是 2010 年后的各地财政收入不再出现地方预算外收入这一项。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参考陈抗（2002）、方红生（2014）的做法，把土地出让收入与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比重度量土地财政偏好。一般来讲，该指数越大，说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攫取之手”效应更明显，土地财政对于地方财政越重要。

由表 4 中列（3）可知，在 1% 水平上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行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价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土地财政偏好指数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就会提高 24.32 个百分点。可见，在地方发展经济过程中，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改善了城市发展环境和居民出行条件，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基础设施评价水平。

表 4 土地财政依赖对城市基础评价的稳健性检验影响

	基础设施评价			
	Oprobit	OLS	Oprobit	OLS
	(1)	(2)	(3)	(4)
土地依赖度	19.056 **	20.317 ***	24.318 ***	22.856 ***
	(2.57)	(2.47)	(2.89)	(3.0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区域变量	NO	NO	YES	YES
准 R ²	0.038	0.054	0.021	0.062
N	3095	3095	3095	3095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性标准差。

(3) 地区异质性表现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影响也会受到区域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在分析土地财政规模变化趋势时，杨圆圆（2010）发现 1999 - 2007 年各地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逐渐加强，尤其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发展模式存在追赶效应，土地财政发展速度远超东部地区。胡李鹏（2012）发现，自九

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西部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人均基础设施存量的发展速度远超东中部地区，因此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李鹏（2013）在研究土地财政对城市公共品供给机制时发现，土地出让金降低了大都市基础设施投入水平，却促进了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公共服务类和基础设施建设类投入，

尤其西部地区的土地出让金投入显著倾向基础设施。因此土地财政或者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因素而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为了考察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是否存在分群样本异质性,本文同时分析了土地财政对于高低收入、东中西部以及城市不同区位下的基础设施评价影响。

首先,我们根据地级市 2012 年的人均实际 GDP 设置了“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再将全部样本从高到底依次排序,2012 年人均实际 GDP 的

50%的分位点是 1.1766 万元。因此,当人均 GDP > 1.1766 万元时,为发达地区,当人均 GDP ≤ 1.1766 万元时,为欠发达地区。表 5 中的列 (3) 和 (4) 结果表明,相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土地财政明显提高了发达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满意度水平。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市场程度比较高,交通基础设施优先发展,在吸引区外资金方面具有优势,满足了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需求,提高了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评价水平。

表 5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分群样本估计

	东中部	西部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	市中心	非市中心
	(1)	(2)	(3)	(4)	(5)	(6)
Land	4.344***	-1.810	8.219**	4.038*	2.728*	14.480**
	(2.63)	(-0.35)	(2.97)	(1.93)	(1.72)	(2.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准 R ²	0.022	0.033	0.038	0.029	0.024	0.055
观测值	2568	527	1525	1570	2706	389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性标准差。

再次,根据地理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中部和西部城市,回归结果见表 5 中的列 (1) 和 (2)。结果表明,东中部城市的土地财政提高了居民对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评价,而西部地区不明显。这是因为截止到 2012 年,土地财政对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明显具有区域特征,东中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尤其处于经济优势的东部地区,大规模的土地财政充裕了东部城市财力,为改善城市发展环境提供了财力保障。在所选取的被访者中,东部样本占到 88.65%,中部 2.82%,西部 8.53%。所以经济发达地区被访者对于所居住的良好基础设施评价要高于经济落后地区,从侧面反映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财政明显改善了辖区的基础设施条件。

其次,本文根据城市区位将样本分为市中心和非市中心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5 中的列 (5) 和

(6)。结果表明,居住于市中心的居民对于基础设施评价要远低于非市中心的城市基础设施评价。这是因为,我国各地城市发展最明显的特征为城市外围的扩张和旧城改造。在 1981 - 2012 年间,我国城市(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数量增长了三倍多,市区面积增长近九倍,外延式的城市扩张必然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营造城市发展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反过来也促进了城市发展,随着城市规划理念的成熟,城市外延基础设施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城市功能和发展布局,充分考虑城市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格局,并且我国城郊基础设施建设更多注重于城市规划,市人口居住集中于市中心,较低的城郊人口密度降低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拥挤程度,提高了周边基础设施的满意度水平。

3. 土地财政的边际效应

表 6 基础设施评价的边际效应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1)	(2)	(3)	(4)	(5)
Land	-0.976***	-0.498***	0.062**	0.798***	0.613***
	(-2.58)	(-2.57)	(1.97)	(2.58)	(2.5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准 R ²	0.172	0.221	0.262	0.256	0.088

N	563	675	795	797	300
---	-----	-----	-----	-----	-----

注: ***, **, *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性标准差。

本文计算了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边际效应,以考察城市基础设施评价存在不同满意度水平的感受变化情况。具体结果见表 6,其中,列(1)至(5)分别呈现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概率的回归结果。由上表 6 可知,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满意度的评价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和程度并不一致。可以看到,人均土地财政在均值处(0.019)每提高一个标准差(0.017),城市基础设施评价“非常不满意”、“不满意”的概率则分别下降 1.66 和 8.47 个百分点,而“一般”、“满意”、“非常满意”的概率则分别提高 0.11、1.36、1.04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土地财政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可以使得城市基础设施评价“非常不满意”、“不满意”的概率降低 9.23% 和 39.27%,“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基础设施的概率分别增加 0.43%、5.34%、10.86%。可以发现,这个效果还比较明显,从侧面反映土地财政影响了城市居民对于基础设施的评价。

4.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在与土地财政相关的文献中,土地财政具有多种衡量指标,除前文中采用的人均土地出让收入外,还有采用人均土地出让面积来反映土地财政问题。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Oprobit 方法检验该指标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 7,表明人均土地出让面积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水平。此外,由于本文仅仅使用了 2012 年的截面数据,对于当期土地财政取值是否稳健仍然需要进行思考。众所周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年度较长,建设资金的投入规模较大,当期投入未必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从 2003 年以来,我国房地产生市场变化剧烈,与其紧密相连的土地市场也强烈波动,因此土地融资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也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水平。为此,基于数据取得的完整性,本文采用 2003 年人均土地出让收入代替 2012 年该项指标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2003 年的人均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具有正的影响,且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样,无论采用何种指标均表示土地财政提高了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价概率。

表 7 基础设施评价的稳健性检验

	城市基础设施评价				
	(1)	(2)	(3)	(4)	(5)
土地财政			4.835*** (2.82)		
03 年人均土地财政	0.143*** (4.95)			0.163*** (4.90)	
人均土地出让面积		0.830*** (2.93)			0.778*** (2.3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区域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准 R ²	0.022	0.021	0.033	0.036	0.033
N	3095	3095	3106	3106	3106

注: ***, **, *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性标准差; 其中列(1)和列(2)为方程(1)的稳健性检验,而列(3)、列(4)、列(5)为重新赋值后的稳健性检验。

尽管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控制了相关潜在的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产生影响的地区和个体特征,但不可避免的是主观评价存在被访者可能不诚实地报告满意度评价。因此不同访谈者会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打分时会出现“高报”或“低报”的情况,会在“不满

意”与“一般”、“一般”与“满意”之间难以精确度量,从而出现被访者误判自身的满意度评价。因此降低这种不利因素的一个简单办法就是对满意度等级重新赋值,将“非常不满意”赋值为 1,将“不满意”、“一般”和“满意”统一重新赋值为 2,将

“非常满意”重新赋值为3。对模型再次计量分析，回归结果见表7。其中，列(3)至(5)分别为人均土地财政收入、人均土地出让面积和2003年人均土地财政收入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回归结果。结果表

表8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

	IV - Oprobit			
	(1)	(2)	(3)	(4)
Land	36.144*** (6.54)	34.801*** (4.94)	37.335*** (7.15)	34.994*** (6.37)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地区	NO	NO	YES	YES
准R ²	0.051	0.063	0.059	0.057
N	3095	3095	3095	3095

注：***、**、*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性标准差。

此外，本文还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例如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满意度的相互作用过程可能会受到政治或者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做了两项稳健性检验。一是为了避免经济异常样本点影响城市基础设施满意度评价，剔除了一些特殊的样本城市，包括10%的经济最不发达城市、10%的最发达城市，并对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土地财政仍然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产生了正向影响。二是考虑到受访者所处城市的行政功能，本文将样本划分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样本，重新对子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土地财政仍然显著影响了城市居民满意度水平。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没有受到其经济因素或者政治因素的影响。

最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会考虑到辖区民意。因此，土地财政与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故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能会受到内生性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外部工具变量策略。由于我国土地出让面积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限制，而且该指标的制定是依据国务院对地方在2000年上报的2000-2020土地规划的批复计算得到。一个普遍现象是越发达的地区，在2000年上报土地规划时预留的未来发展用地越多，而落后地区预留则相对较少。而一旦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建设用地不足的情况，地方一般会优先保证商住用地的供应，这就导致发达地区的工业用地比例普遍高于落后地区。而且汤玉刚(2012)和甘犁等(2013)发现土地出让中协议出让的比重与土地出让价格直接相关。Chen(2016)分析中国土地收入和政治资源诅咒时，发现地形因素会影响到土地出让的类型。Saiz

明，考察土地财政对重新赋值的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变得更显著了，说明被访者对主观评价的非真实反应并不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2010)借助气象卫星数据发现，美国大都市居住用地发展受到地形坡度的制约，进而影响到住房价格和人口发展。李力行(2016)研究发现，地理坡度平缓的城市通过协议方式出让土地的比重较高。参考李力行(2016)的方法，基于各地级市地理特征来构造土地财政的工具变量-城市中地表坡度低于15度的土地比例。回归结果见表8。其中表8中的列(1)没有控制任何变量，列(4)控制了地区层面的变量。由回归结果可见，土地财政显著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且在克服内生性后，对居民基础设施满意度的评价更大了。具体来说，土地财政规模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满意度水平就会提高34.994个百分点，说明本文的假设是合理的，主要结论并没有因内生性而发生改变。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了土地财政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关系，验证了土地财政明显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评价，并且发现土地财政偏好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价效果更显著。结论显示：(1)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大力扶持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发展，土地财政是提高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主要投入，在增长竞争过程中会为提高本辖区资本流入水平而大力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了居民对辖区公共品供给的社会评价；(2)我国东中西部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条件具有很大差异性，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对东中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或非市中心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水平影响较大。通过土地财政与城市基础设施评价的关系来看，

本文认为城市基础设施评价水平的提高归因于近年土地财政投入，但是随着农业用地保护制度、土地市场的完善、政府预算管理的加强和执政理念转变等制约，土地财政粗放式投入的模式也会相应改变。对此，本文有如下政策启示：（1）协调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和经济发展关系，加强对于城市发展规划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合理处理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程度，提高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降低土地财政融资热情和城市基础设施超常规发展的速度，协调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兼顾土地财政对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非经济性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2）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应兼顾辖区企业或者居民的意见，政府执政理念和增长竞争重点的转变，凸显出社会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有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和基础设施管理水平，这对服务型政府的顺利推行、居民生活的保障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Alesina A. , Baqir R. , Hoxby C.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2) : 348 - 396.

[2] Aschauer D. A. 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23(2) : 177 - 200.

[3] Blomquist G. C. , Berger M. C. , Hoehn J. P. New Estimat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Urban Area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1) : 89 - 107.

[4] Casas ,C.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El Caso de Peru. Santiago de Chile , CEPAL ,1997.

[5] Chen T. , Kung K. S. Do land revenue windfalls create a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3: 86 - 106.

[6] Cremer , H. , Marchand , M. and Pestieau , P. Investment In Local Public Services: Nash Equilibrium And Social Optimum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 1997 65(1) : 23 - 35.

[7] Duffy - Deno K. T. Dalenberg D R. The municipal wage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J]. *Urban Studies* ,1993 30(9) : 1577 - 1589.

[8] Dumludag D. Consump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5 62(2) : 1 - 20.

[9] Epple D. , Zelenitz A. The Implications of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Does Tiebout Need Politic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6) : 1197 - 1217.

[10] Farhadi M.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long - run economic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 Practice* ,2015 ,74: 73 - 90.

[11] Frey B. S. , Stutzer A.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2) 402 - 435.

[12] Hayek , Friedrich.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 35(4) : 519 - 530.

[13] Hummels D. L. Toward a Geography of Trade Costs Gtap [R]. Working Paper ,1999.

[14] Munnell A. H. Why has productivity growth declined? Productivity and public investment [J].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1990 30(1) : 3 - 22.

[15] Raymond J. L. Wages and Accessibility: The Impact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J]. *Regional Studies* , 2015 49(7) : 1236 - 1254.

[16] Roback J. Wages , Rents ,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2 90(6) : 1257 - 1278.

[17] Roni Frish , Shay Tsu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 Commuting , and Wage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2) : 341 - 346.

[18] Rosenstein - Rodan P. N. The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 - Eastern Europe [J]. *Economic Journal* ,1943 53: 202 - 211.

[19] Saiz A. The Ge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Suppl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 125(3) : 1253 - 1296.

[20] West L. A. , Wong C. P. W.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row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Rural China: Some Evidence In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995 ,11(4) : 70 - 84.

[21] Zodrow G. R. , Mieszkowski P. Pigou, Tiebout , property taxation , and the under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6 ,19(3) : 356

[22]陈刚等. 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 —关于中国式分权的一个假说及其验证[J]. 南方经济, 2009, (7): 3 - 15.

[23]陈抗, Arye L. Hillman, 顾清扬.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 经济学(季刊) 2002 2 (4): 111 - 130.

[24]邓明. 中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与就业密度的关系—内生关系与空间溢出效应[J]. 经济管理, 2014 (1): 163 - 174.

[25]樊纲, 王小鲁. 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J]. 经济研究 2004(5): 13 - 21.

[26]樊丽明, 骆永民. 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9, 30 (9): 51 - 59.

[27]方红生, 张军. 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再评估: 攫取之手还是援助之手? [J]. 管理世界 2014 (2): 21 - 31.

[28]方红生, 张军. 攫取之手、援助之手与中国税收超 GDP 增长[J]. 经济研究 2013 (3): 108 - 121.

[29]甘犁等. 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 金融研究 2013 (4): 1 - 14.

[30]胡李鹏, 樊纲, 徐建国. 中国基础设施存量的再测算[J]. 经济研究 2016 (8): 172 - 186

[31]李力行, 黄佩媛, 马光荣. 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J]. 管理世界 [J]. 2016 (8): 86 - 96.

[32]李鹏. 土地出让收益, 公共品供给及对城市

增长影响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3.

[33]刘倩倩等. 中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地理研究, 2017, 36 (9), 1627 - 1640.

[34]乔宝云, 范剑勇, 冯兴元.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6): 37 - 46.

[35]乔宝云. 增长与均等的取舍[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36]孙秀林, 周飞舟. 土地财政与分税制: 一个实证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4): 40 - 59

[37]王文剑, 覃成林.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J]. 管理世界 2008 (1): 9 - 21.

[38]王贤彬, 张莉, 徐现祥.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 (7): 31 - 43.

[39]王永钦等.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 经济研究 2007 (1): 4 - 16.

[40]肖挺. 中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就业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4): 96 - 104.

[41]杨圆圆. “土地财政”规模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 财贸经济 2010 (10): 69 - 76.

[42]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43]左翔, 殷醒民. 土地一级市场垄断与地方公共品供给[J]. 经济学(季刊) 2013, 12 (1): 693 - 718.

(编辑校对: 韦群跃 陈崇仁)

(上接第 35 页) [13] 赵莹.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收入差距[J]. 世界经济文汇 2003(4): 55 - 70.

[14] 曹博. 贸易开放度、FDI、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1): 128 - 134.

[15] 张懿. 中国对外开放与区域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 2017(7): 123 - 128.

[16] 何璋, 覃东海. 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題——以中国为例[J]. 世界经济研究 2003(2): 38 - 43.

[17] 人民论坛测评中心. 对 19 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放度的测评及排名[J]. 国家治理, 2018 (2): 2 - 13.

[18] Amidzic G., Massata A. and Mialou A. Assessing Countries' Financial Inclusion Standing: A New

Composite Index [R]. working paper, 2014.

[19] Zhang J., Wang L. and Wang 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2, 40(3): 393 - 412.

[20] 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9): 4 - 16.

[21] Vollrath D. How Important Are Dual Economy Effects for Aggregate Productivit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8(3): 325 - 334.

[22] 谢千里, 罗斯基, 张轶凡. 中国工业生产率的 增长与收敛[J]. 经济学(季刊) 2008(4): 809 - 826.

(编辑校对: 孙敏 吴洪敏)